深圳经济特区早期两大定位的探索及价值

袁 圆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深圳经济特区在早期有两大定位,一是经济特区应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二是经济特区要不要成为改革试验区。这两大定位对深圳发展成为全球高科技大都市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经过争论、探索、权衡,在多重选择中,深圳最终选定当时最先进的电子信息工业为主导和支柱产业,把深圳建成具有引领全国改革意义的"改革试验区"。两大定位使社会主要矛盾"两面"和谐,使发展和改革"两翼"双飞,使改革试验区和先行示范区"两区"融合。保持优势是深圳当前的重要任务。自从将电子信息工业作为支柱产业,深圳在这个领域已产生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企业、技术和产品,要继续保持这个领域的优势,仅有庞大的产业集群还不够,还需要强大的产业集群。首先要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更多突破,占据产业和行业的制高点;其次要有完整的产业集群和链条,形成强大的产业合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改革的先锋,深圳再一次迎来宝贵机遇。深圳应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带动其他方面改革。从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的"顶层设计",深圳需确保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为全面发展创造制度优势。

[关键词] 经济特区 早期定位 现实价值 电子信息工业 改革试验区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5)05-0027-10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于1980年,在早期有两大定位,一是经济特区应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二是经济特区要不要成为改革试验区。这两大定位在早期并不明确,存在广泛争议,经过非常艰难的探索,最终形成清晰的方向——经济特区应以先进的电子信息工业为产业核心,经济特区应成为改革开放试验区。这两大定位对于深圳能否成为全球著名的高科技大都

市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①

一、深圳经济特区先进电子信息 工业的确立

(一)经济特区的"自由贸易区"属性 经济特区建立前夕,正是世界上自由贸易区

收稿日期: 2025-01-20;修回日期: 2025-05-01

作者简介: 袁圆、讲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教育改革研究。

①1981年5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调研室撰写了《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若干问题》,作为内部参考供领导层参阅。他们深入调研,多次召开研讨会,并对国外的特区进行比较研究,对经济特区的定位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是发展当时世界先进的产业,利用邻近香港的优势引进外资和企业。1979年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包括经济特区。谷牧副总理兼任主任,江泽民等为专职副主任,李灏为专职委员、副秘书长。经济特区早期有很多关于产业和城市定位的文章,《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若干问题》是最系统、最具权威性的一篇。

和加工贸易区盛行的时候。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加拿大等西方早期发展起来的沿海国家,都成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和加工贸易区。这种模式是在沿海地区设立特定的海关监管区,实行关税减免政策,以吸引外来投资。英国率先崛起,成为"世界工厂",至182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1][P80]美国作为后起之秀超越英国,也一度成为"世界工厂"。[1][P81]香港虽面临土地、水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却有世界上最优良的港口之一。香港早期通过建立自由贸易港,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和"亚洲四小龙"之一。

1980年,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均位于广东省和福建省的沿海地带,具备优良的港口条件和历史悠久的口岸。1988年,原属广东省的海南岛设立为省并成立经济特区,海南作为中国第二大岛,对外开放的条件非常优越。中国经济特区的布局均位于东南沿海,其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即学习借鉴西方自由贸易区和加工贸易区的成功经验。[2]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经济全球化促使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向外转移,以自由贸易区和加工贸易区承接产业转移成为难得机遇。沿海地区许多干部和学者都提出抓住机遇,设立特殊区域承接产业转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1978年率团到欧洲五国考察,对这些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感受深刻。[3][P314-318]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上任不久即来到深圳,对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做了详细了解。[4][P28]两位领导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可以在沿海区域设立自由贸易区和加工贸易区的建议。考虑到这些做法都是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经验,容易引起担忧和争论,邓小平同志提议用"特区"这一名词。1979年,中央50号文件提出"出口特区",1980年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5][P14]

深圳具备建设自由贸易区的优越条件。首 先深圳沿海,自然水深,有建设大型港口的优良 条件。著名的"改革开放第一声炮响",即指深 圳蛇口港的建设,此后深圳相继建了赤湾港、妈 湾港、盐田港等国际港口。其次深圳紧邻南海,而南海是世界主航道之一,适合大宗物资的运输。当时各经济特区都设立了一线关和二线关两道防线,特区内相当自由贸易区,享受关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深圳确立了"三外"策略,即投资以外资为主,工业以外企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这成为经济特区早期"自由贸易区"的初步定位。[5](P39)

纵观全球,自由贸易区通常位于沿海地区, 面积较小,便于吸引外商投资,同时避免关税优 惠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香港是一个例外,其 全域均为自由贸易区,主要由于香港面积较小, 便于实施封关管理。深圳经济特区最初包括罗 湖、福田、南山、盐田等四个行政区,总面积为 327.5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16.4%。深圳起步 时仅是一个农业县,不少人认为,深圳经济特 区面积有限,建成一个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区域 即可,包括国家相关部门的同志也有此看法。然 而,深圳的决策者认为,自由贸易区只能作为深 圳全面发展的一个"引线",而非全部。港口建 设不仅服务于经济特区,更应服务于整个深圳 乃至珠三角地区。今天看来,这个决策非常正 确,港口建设有力带动了深圳乃至全国发展,而 不是仅仅停留在自由贸易区。至2020年,深圳经 济特区已扩展至全市范围。[6](P77-78)

(二)经济特区的加工贸易

既然经济特区是加工贸易区,其功能相当于自由贸易区,加工贸易自然成为经济特区的主导产业。香港的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到80年代达到顶峰,随着土地、厂房、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升高,香港已经不再适宜发展一般加工贸易产业。历史上,香港曾经是新安县的一部分,新安县逐步演变为今天的深圳市。香港产业转移至深圳最为方便且成本最低,故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香港的工业几乎全部转移到深圳。同时,正值世界产业转移的高潮期,深圳也接受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的产业转移。[7](P33-34)

从1980年至1985年,加工贸易迅速成为深

圳的主导产业。原特区内的福田区八卦岭、华强北成为加工贸易的主战场,原特区外的宝安区、龙岗区也以加工贸易为主。这个时期深圳有1200多家由农村集体经济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公司,加工贸易产值占总收入的90%以上。^[8]每当上班和下班的高峰,一望无际的打工者队伍行走在大街小巷,成为深圳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景观。珠三角工厂云集,是著名的世界工厂,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现象,出现了"打工仔""打工妹"等新名词,"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一俗语在当时广为流传。

加工贸易是"工业+贸易"的一种特殊方 式, 当时有"三来一补"和"两头在外"两种形 象的表述。"三来一补"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 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两头在外"则意 味着技术和市场均位于国外或境外, 仅加工环 节在本地。该模式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盛行, 主要是因为转移方和接受方均有所需。对于转 移方而言,成本的上升迫使其将产业转移到成 本较低的地区以维持竞争优势; 对于接受方而 言,发展工业是实现从农业向工业快速转型的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由于世界区域发展水平 的梯度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向欠发达国家和 地区产业转移成为可能。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 显著问题, 如转移的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工业, 例如电子元件、电池、电镀、金属、皮革等,这些 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较为严重。此外,接 受方在技术和市场方面缺乏自主性,难以掌握 主动权,产业升级面临挑战。[5](P42)

加工贸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成为深圳的主导产业,主要得益于产业转移以及深圳原本以农村为主的背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为推进工业化进程,先后实施了三次农村城市化改造。第一次发生在1992年,覆盖范围为经济特区,涉及68个行政村、一个农场及4万多常住农业户口农民。第二次在1993年,范围扩展至经济特区外,将宝安县改制为宝安、龙岗两个市属行政区,深圳市也由此成为土地面积全部为市区面积的城市。第三次则是在2003年,主

要任务是完成第二次农村城市化遗留的工作, 实现经济特区外农村体制向城市体制的全面转 变,常住农业户口农民也全部转为城市居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深圳经济特区早期主要 处于农村体制。对于农村和农民而言,加工贸易 是最为适宜的产业选择,因为它风险最小、收 益最大。只需出租土地和厂房,便能获得丰厚的 租金回报,无需进行技术创新,也无需开拓国际 市场。^[8]

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加工贸易这种短平快的工业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许多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其潜在的危机,并认识到转变这种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加工贸易已深深扎根,成为主导产业,局部调整难以起效。究竟是继续发展加工贸易,还是加以限制并推动产业转型,这一问题在1985年前后引发了广泛讨论。赞同者认为,加工贸易起步迅速、资金回流快、风险较低,非常适合深圳这样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而反对者则指出,这种工业模式的主导权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始终扮演着"打工仔"的角色,难以摆脱"世界工厂"的命运,未来风险不容忽视。珠三角部分地区也意识到加工贸易的局限性,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战略,但实际推进过程却异常艰难。

深圳的决策者们非常清楚,这种产业如同 浮萍,难以扎根,更难以向高科技产业升级。由于缺乏技术和市场掌控力,我们只能获取微薄 的加工费,而利润的大头则被外商攫取。没有加工贸易,深圳便缺乏产业基础。因此,当时的决策是,在早期阶段充分利用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绝不能止步于此,必须同步推进产业转型。转型的困难主要在于人们习惯了这种产业模式,且大量厂房也是为加工贸易而建。要实现转型,不仅需要转变思想观念,还要进行厂房功能的转换。华为的成功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最初,华为也从事加工贸易,但他们在模仿中不断学习和创新,最终掌握了核心技术。相比之下,不少原农村股份合作公司未能及时转型,如今只能依靠物业出租维持生计。

(三)经济特区的商业贸易

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深圳的服务业逐渐升温。深圳毗邻香港,位于国际商贸通道的关键位置,具备发展商贸活动的天然优势。1985年建成的国贸大厦,作为当时国内第一高楼,其四层裙楼的商场设施也引人注目,成为游客最爱光顾的商场之一。此后各类商场大量涌现,深圳成为国内时装产业的中心之一。国际贸易规模从小到大,贸易额实现了迅速增长。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1700万美元,至1992年增长至235.77亿美元,此后深圳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于内地大中城市之首。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不良风气的蔓延。 得益于国家对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进口物资 用于生产再出口,可以免征关税。有部分商家利 用此政策,将进口物资直接倒卖至内地,通过 差价交易牟取利益,这个做法引起全国范围内 的不满。

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酒店业亦发展迅速,但同时也暴露出潜在的危机。据深圳市统计局1984年的初步统计,酒店的床位数有2万多个,正在建的酒店还将提供2万余个床位,这一数字超过了香港的总床位数,而1984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仅为74.13万人,远低于香港的542万人。

深圳作为边境城市,商业贸易是优势也是特色,有观点主张将其作为主导产业,部分替代工业。但主管经济特区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家的一些部委则认为,深圳应以先进工业为主,即使发展商业贸易,也应把工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此后,深圳开始大量削减基础设施投资,固定投资主要向工业项目倾斜。[9](P351-359)

1985年11月,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在深圳召开发展外向型工业座谈会。会议明确指出,深圳要重点发展轻、小、精、新工业。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明确了经济特区产业结构应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

但是,转变发展思路的过程仍然很艰难。

分管经济特区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他的 回忆录中提到:"直到1985年2月下旬,我才腾出 手来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讲 了全国开放的好形势,讲了特区的新进展,也指 出若干需要认真注意解决的问题,包括基建铺 的摊子大,消费资金增长过快,还有违反政策 发不义之财等等。可以,会是开过了,有的特区 还是照他们想的干。1985年深圳铺的建设摊子 更大。而且对我讲的上述意见不大以为然,对 人们提出的善意批评采取'顶'的态度。4月份 给深圳负责同志传去一个书面的东西, 重申我 在2月会议讲的要压缩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要向 着办好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综合性特 区作刻苦的努力,不要故步自封,绝不能干那些 违反政策、遭受谴责的事。这个书面意见传去 后,效果还是不大理想。根据小平同志的有关 指示, 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决定对深圳特区的 领导班子进行适当调整。"[3](P388)

(四)确立电子信息工业

从一般加工工业到高科技工业的转变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没有加工贸易,就没有快速的资本积累,也没有向更高技术工业转型的基础。深圳并非一开始便具备发展高科技工业的条件,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技术和工业基础,其高科技转型的条件和能力是在加工贸易相对成熟之后才得以具备。深圳在产业发展上不能拒绝加工贸易,亦不能强行推进产业转型,而应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

深圳目前的定位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经济特区早期明确"经济"定位并持续坚持的结果。在当时,能够影响和改变深圳"经济"定位的因素众多,汽车工业便是其中之一。20世纪80年代,汽车工业作为世界朝阳产业,吸引了国内众多地区与外资企业合作建立汽车公司,形成了一股全国性的汽车热潮。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凭借其沿海的有利位置,成为了世界汽车巨头争夺的战略要地。宝马、奔驰、大众、丰田等国际汽车品牌纷纷寻求与深圳的合作。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深圳最终决定放弃发展传统

的汽车工业。目前,深圳选择以比亚迪为代表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一选择与深圳的产业结构 高度契合。

钢铁工业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东省计划在原有的广州钢铁工业基地基础上,将深圳也纳入钢铁工业基地的规划之中。然而,深圳认为,若新增钢铁工业基地,湛江是更为合适的选择,因为其港口条件优越,具备足够的产业布局空间,而深圳土地资源紧张,且深圳港口面向珠三角,更适合集装箱运输。目前,湛江的钢铁工业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石油化工一直是世界强势产业,沿海城市由于具有港口的优势,是石油化工的首选之地。深圳的邻近城市惠州计划建设世界级的石油化工基地,广东省沿海其他城市也进行了石油化工产业的布局。深圳曾经也想趁这股浪潮发展石油化工产业,并初步拟定在靠近惠州的坝光建立石化工业园,但经过多年论证,最终也选择了放弃。[10]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深圳确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并非易事,任何犹豫或动摇都可能导致选择其他重工业,从而改变深圳的产业结构。

深圳经济特区早期有两个举措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将电子信息产业确定为主导产业,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1985年8月,深圳市人民政府与国家电子工业部初步商定,把深圳作为全国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与北京和上海并列。电子工业部与深圳市政府合办电子总公司,并在深圳设立办事处,成立电子行业协会。此举意义重大,深圳将"轻小精新"作为产业发展方向,开启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之路。电子工业部与深圳市政府合办电子总公司,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赛格集团,而闻名全球的华强北电子街也由此形成。[9](P346-347)

1987年2月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 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深 府[1987]18号)正式公布。深圳当时产业基础 薄弱,原宝安县仅有几家小型企业。上述规定 发布后,民间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华为 就是在这一年成立的。直至今日,深圳的科技企 业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 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也主要依靠民营企业。

1999年,深圳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高新技术成果交流交易的重要平台。通过高交会,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以电子信息为主的先进工业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2024年,深圳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5406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2409亿元,这两个指标均名列全国大中城市之首。

二、深圳经济特区改革试验区的 形成

(一)开放推动改革

经济特区的"经济"两字已经表明了特区的属性。初始阶段,经济特区并不具备改革实验区的属性,随着特区的持续发展,改革的属性逐渐显现,其主要动力来自开放的推动和时代的迫切需求。

自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人口急剧增加。原宝安县只有40多万人口,城关镇深圳只有3万人口,1979年撤宝安县建深圳市,至1985年深圳常住人口已达到88万人。粮食问题、肉菜问题、用水用电等问题接踵而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按人头定量供应,紧缺物资凭票限量供应,显然无法适应深圳人口的快速增长。深圳首先进行物价体制改革,放开粮食供应,取消绝大多数票证,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许多商家发现商机,纷纷从全国各地调集物资。深圳市国有企业兴办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供应市场和稳定物价。深圳的市场经济第一课,始于商品供求关系和物价稳定。经济特区建立初期,即采取市场经济的手段,从而较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1][P3-4]

作为外向型经济特区,深圳与外商来往密切,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企业设立、项目立项需要经过繁琐的审批流程,多次跑腿,甚至有的项目需要盖一百多个公章,耗时一年甚至数年才能完成。深圳开始对机关职能和审批事项进行改革,集中办理,简化流程,下放权限。深圳是全国最早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城市,旨在加快企业注册速度。深圳也是全国最早进行立项权限制度改革的城市,目的是促进优质项目的快速落地。

外汇体制改革异常艰难,但最终取得成功。 作为外向型经济特区,进出口贸易是深圳的重点 行业,所占比重很大,到2024年,深圳出口总额 连续32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外汇体制是国 家体制,汇率由国家确定。20世纪80年代,按照 官方固定汇率,出口基本处于亏损状态。一些企 业绕过中国银行,私下进行交易。尽管纪检监察 部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抑制了黑市 交易,但也打击了外贸出口。在这一困境下,深圳 率先突破,建立市场化的外汇调剂中心。新的外 贸体制保障深圳外贸的健康和繁荣。

(二)时代呼唤改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关于深圳是否应成为改革试验区,社会上存在较大争议。部分人认为,经济特区的设立已经明确其"经济"属性,不要节外生枝、画蛇添足,最终可能两头都搞不好。另一些人则指出,计划经济作为国家体制在全国实行了30多年,试图在深圳这样一个小范围内进行根本性改革,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但更多的人认为,深圳应该肩负改革使命,成为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深圳要勇立潮头,抓住改革机遇,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1985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提到: "经济特区还是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12](P133)

邓小平希望深圳成为改革试验区, 主要是 基于对全国改革全局推进的考虑。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民党遗 留的经济基础之上, 我们迅速恢复和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国民经济体制,特别是"一五"计划的 156个大型项目, 形成了国民经济的基本架构。 但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和强制性,不利于 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其平均主义做法, 也不利于 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些问 题越来越突出。农村开始自发地分田到户,城市 出现国有企业承包制和租赁制,个体经济和民 营经济大量涌现。计划经济的垄断地位已经被 打破,市场经济已经开始萌芽。邓小平认为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顺势而为,通过改革 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由于计划经济的深厚历史 根基和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影响, 突破这一经济 体制的难度极大。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显著,采取渐进式的试 验方法是更为稳妥的策略。邓小平提出"杀出 一条血路"和"摸着石头过河",而经济特区是 实践这一理念的最佳选择,几个经济特区都是 中小城市, 计划经济的包袱相对较轻, 它们需要 通过改革探索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三)改革带来活力

实践证明,深圳成为改革试验区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通过改革,深圳经济特区成功解决了众多体制机制问题,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深圳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举措是其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建立。该体制的构建并非一帆风顺,过程中伴随着持续的争议和波折。深圳的改革从要素市场起步,进而扩展至国有企业和政府体制。最初,深圳对粮油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实施市场化调节,随后逐步放开其他生活物资,这一做法曾被批评为向资本主义看齐。土地等生产要素改革是重点,中国宪法规定土地不能转让,但深圳采取了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策略,并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此做法曾被指责为违

宪,并要求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使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并建立了三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一措施亦被批评为私有化。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取消直接管理企业和管理微观经济事务的部门,政府职能转向主要通过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9][P349]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充分肯定深圳的发展和改革,他认为深圳取得的成就出乎意料,深圳的重要经验是敢闯。邓小平还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市场经济探索和体制的建立,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P373)

三、两大定位的现实价值

(一)两大定位使社会主要矛盾"两面"和谐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其发展既可受到生产关系的促进,也可能受到其阻碍。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通过科技革命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改革的核心目的在于调整生产关系。

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在不同历史阶段准确 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P11)党的 二十大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 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 建立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和措施。[14](P18-23)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列出300余项改革任务,旨在通过改革推动中国 式现代化,通过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 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相互 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 障。^[15]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改革发展目标,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是改革,抓住社会主要矛 盾,突出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侧面,有利于相互 促进,达到协调发展。

深圳早期的两大定位是发展和改革,实际 是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两个方面,深圳在起 步阶段就准确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遵循了矛 盾发展的基本规律。深圳不仅清晰地区分了主 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且实现了这两个方面的 相互融通与促进。

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正值改革开放起步时期,承担改革任务成为其必然使命。经济特区类似自由贸易区,其主要工作包括引进外资、合作办厂、扩大进口等。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体制、制度等方面的摩擦比较突出,经济特区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深圳外汇体制改革,形成了市场化外汇汇率,主要是为了解决出口问题,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外汇体制不利于出口,出口越多反而亏损越多;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实现了土地市场化,主要解决土地的高效利用问题,因为外商在深圳投资办厂需要土地,而土地的不可流动性阻碍了经济合作。

经济的定位让深圳找到了发展的主业,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竞争力;改革的定位让深圳成为改革前沿,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推动发展。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的理论基础,从而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和发展。

2024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36802亿元,排在上海、北京之后,名列内地大中城市第三位,45年来,深圳年均增长20%。深圳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改革全面深化的良好局面。

(二)两大定位使发展和改革"两翼"齐飞

深圳正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创新""科技"是深圳的鲜明特征和竞争优势。

目前深圳已形成了高科技、金融、物流、文 化四大支柱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其中高科 技产业占据核心地位,其产业增加值占四大支柱产业总增加值的一半。而高科技产业中,电子信息产业占比达90%以上。深圳还确立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及二十大产业集群,2024年深圳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2%。深圳在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人工智能、网络通信、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

深圳市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中国改革开放先锋""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地",这一地位和荣耀的获得,归功于经济特区早期对"改革"的定位。赋予经济特区"改革"的职能和内涵,主要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和经济特区自身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弊端也很突出,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思想的指导下,与 国际的经济往来受到限制。在这种体制下,"短 缺经济""票证经济"成为常态,许多人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要解决的就是发展问题,通过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发展。由于触及到传统发展模式,必然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传统理论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一直是争论的热点。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需要特别慎重,逐步推进。

深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改革试验区"的职能,而是时代需要与深圳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深圳的大胆改革和成功实践,让改革成为其鲜明的城市标志。深圳成功开创"改革试验区"模式,不仅对深圳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全国各地的改革产生积极影响,改革试验成为全面推动改革的先行程序。全国各地的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等,都承担着改革试验的功能和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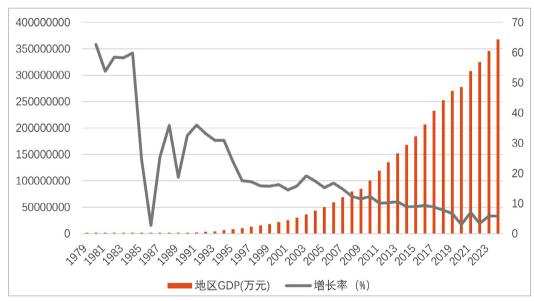


图1 1980—2024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和增长率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从图1可以看到深圳发展与改革的正相关关系,1980—1984年深圳年均增长率在50%~60%,这时经济特区刚刚建立,国家赋予深圳先行先试特殊政策,密集出台许多改革措施,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各方面的积

极性。1986年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这是深圳产业大调整时期,对过热的经济,特别是加工贸易、商业酒店业等进行调整。经过调整,在1987年、1988年增长率又回到20%以上。1992年邓小平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充分肯定市场经济

和民营经济,此后几年深圳的增长率在30%以上(见图1)。

(三)两大定位使改革开放试验区和先行示范区"两区"融合

如果说深圳有独特优势,那就是发展和改革。凭借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优越的地理条件,深圳实现了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的飞跃式发展。在发展历程中,尽管面临"特区过时论"的质疑,深圳始终不为所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改革推动了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深化了改革,改革与发展的相互促进,为深圳的持续进步提供了动力。

2020年10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对深圳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 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16](P2)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他指出: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 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 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16](P4)

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是深圳的一大跨越,标志着其发展进入新阶段,不仅要先行试验,还要承担先行示范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16][P7]

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的发布,为深圳设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求深圳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实现全 面发展,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 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 治环境,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 现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 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中国典范。到2035年,深圳将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 先,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 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将发展成为竞争力、 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17][P2-4]

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任务也包含了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在发展方面,深圳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实现全面发展;在改革方面,深圳将通过"授权改革"和"清单式改革"等措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圳早期的两大定位,为其承担先行示范区这一艰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圳早期的两大定位已成为其发展的强劲动力,保持这一优势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自从将电子信息作为支柱产业,深圳在这个领域已产生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企业、技术和产品,如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以及这些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先进产品。深圳要继续保持这个领域的优势,仅有庞大的产业集群还不够,更需要强大的产业集群。首先要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占据产业和行业的制高点;其次要有完整的产业集群和链条,形成强大的产业合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再次迎来宝贵的发展机遇。深圳应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带动其他方面改革,从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的"顶层设计",使改革更具全局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为全面发展创造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

[1]樊亢,宋则行. 外国经济史[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1965.

[2]袁晓江. 深圳经济特区名称的由来[J]. 百年潮,

2020(12): 17-25.

[3]谷牧. 谷牧回忆录[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4]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习仲勋主政广东忆述录[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5]袁晓江. 深圳经济特区40年[M]. 北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20.

[6]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李灏深圳特区访谈录[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0.

[7]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经济特区的由来[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8]袁晓江.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集体经济及其出路[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4(3): 68-76.

[9]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 访谈录[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0] 樊鹏, 江湘平. 李灏在深圳: 一个改革者, 一个明白人[J]. 红广角, 2011(8): 15-20.

[11]李灏. 李灏深圳工作文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12]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3]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6]习近平.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责任编辑 袁竑源】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wo Early Orientations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It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YUAN Yuan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ere were two major orientations, what kind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pecial zone should have and whether it should become a pilot area for reform. These two orientations were directly related to Shenzhen becoming a global high-tech metropolis and the forefron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with great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After debates, explorations, and careful deliberations among multiple options, Shenzhen ultimately chose to develop the most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at time as a leading and pillar industry, aiming to build Shenzhen into a "reform pilot zone" that would lead national reforms. These two orientations harmonized the primary social contradictions on both sides, promoted the dual developmen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integrated the reform experimental zone with the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Maintaining its advantages is a crucial task for Shenzhen today. Since Shenzhen design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its pillar industry, a large number of world-renowned companies,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have emerged in this field. To continue maintaining its edge in this sector, Shenzhen needs not only a vast industrial cluster but also strong clusters. First, there must be more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standing at the pinnacle of industries and sectors; second, there must be complete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chains, forming a powerful synergy within the industr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et clear requirements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 Shenzhen, as a pioneering force in reform, now faces another rare historic opportunity. Shenzhen must prioritize economic reform to improve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reby driving reforms in other areas. It needs to move from the early "cross the river by reaching stones" to the current "top-level design", ensuring that reforms ar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coordinated, creat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Keywords: Special Economic Zone; early positioning;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reform pilot area